

# 未来十年的中国<sup>1</sup>

## 摘要

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发展是关键十年。未来中国要保持均衡增长，同时妥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面对诸多挑战，克服诸多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靠改革和创新。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进行了高速追赶，迅速缩小了与美国经济的差距。根据我们的估算，到 2020 年，中国的名义 GDP 总量将达到 22.9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 2030 年，中国的名义 GDP 将达到 59.4 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 1.7 倍。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一种状态。为缓解社会压力，一些国家采取民粹主义的高福利分配政策，在政府财力难以支撑时，又超发货币并举借外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未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因素是：（1）投资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

---

<sup>1</sup> 本文是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写成的。研讨会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福轩大教室召开。参加研讨会的有（以发言前后为顺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

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 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负增长, 人口红利消失。分解过去我国高速增长的来源, 每一种生产要素对于高速增长的贡献都包含人口红利的影子。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同时, 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均贫富传统的国家, 在大众媒体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调整收入分配的强烈呼声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一旦收入分配政策发生错误, 就可能刺激左右极端思潮的膨胀, 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克服诸多挑战与困难。第一,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完善经济结构中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源泉; 第二, 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 成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一种是扬汤止沸, 一种是釜底抽薪。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 需要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 把问题的根源消除。

**改进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和贪污腐败问题, 根本上是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 很大一部分是初次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较好的解决方式是, 在初次分配时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 再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要在初次分配中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 就要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按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区段, 可以创造更多就业, 让工薪阶层得到就业机会, 分享经济发展果实。这样的发展方式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向资本相对丰富, 劳动力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中, 工资会快速上涨, 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 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从根本上改善。

**调整经济结构, 保持经济均衡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 需要发掘新的增长源泉, 从供需两方面寻找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通过解决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 调整经济结构的失衡, 扩展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边界。在供给方面, 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一个源泉是改革。需要通过改革完善经济结构, 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完成市场化改革。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 减少政府的过度介入, 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一些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需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 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源泉是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和改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为不同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创造和积累人力资本。

在需求方面，需要进一步挖掘有效需求，开拓国内和海外市场，调整总需求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结构，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同时适当减少净出口的份额。扩展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是稳步推动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涉及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住房市场和财税改革，极其复杂。需要周密设计，妥善公平处理各方利益，同等保护公有和私有产权。还需要通过税收体制的改革，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获得可靠的收入来源，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长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为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保护和培育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重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保护产权。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社会结构能否保持流动。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释放了社会活力，最近社会结构却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趋势，代际相关性提高，社会流动性下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无法保证。需要把中国更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夯实。

## 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度改革。过去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滞后，经济体制改革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状态使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十分突出。

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以下任务。第一，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第二，党政分开。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化和民主制度构建的前提。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进行机构改革，而党的机构没有改，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改革。第三，宪政建设。宪政就是在民选代表制约下的有限政府。民主化应当通过宪政秩序的安排来展开。一党宪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需要通过《宪法》、《党章》等规范性文件规定党和国家的关系，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处理党和人大等各方面的关系，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要把宪政明确写进改革纲领。宪政与民主的关系，应当宪政在前，民主在后。第四，创造民

主机制。制度如果不创造某种民主机制就很难长治久安。可以从基层民主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民主。第五，法制建设。要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和司法的权威性。第六，重建社会秩序，发展公民社会。需要考虑城市化改变城乡格局以后的社会格局，即以哪一级行政机构为社会结构的支点的问题。公民社会的欠发展，可能助长民粹主义情绪，造成极端势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必须在政府控制下稳步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第七，探索中国真正的核心价值观。重塑价值体系，回归中国的传统价值，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财政体制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民主政治是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权的制衡问题，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审议和制约的问题。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包括：（1）倒逼原则。任何重大改革都是在压力下启动的。足够的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只有出现了危机，人们才能形成共识，看清道路，决然前行。（2）相信草根的智慧、尊重人们的选择。（3）推进渐进实验性试-错型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验，由点及面，控制风险。从改革的推动力的角度分析，改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常规性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是边际性、部门性的，不涉及对基本体制框架的挑战，争议较少。（2）突破性改革。其特点是在体制框架边界进行拓展，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效果。（3）系统性改革。

矛盾的倒逼对改革的启动至关重要。目前可能的倒逼因素包括：（1）维稳。（2）腐败。（3）收入分配差距。（4）房价及其背后的货币扩张架构。（5）国有企业改革。（6）增长速度减缓。（7）对于中共党史问题的新认识。（8）改革共识度、改革呼声与改革实际进度的差异。（9）人口老龄化对人口政策改革的促进。（10）城市化引起的农村土地产权、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和城市内部新的贫困和治安问题。（11）我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问题。（12）党内解决争端的方式问题。

## 国际定位

在中国经济体量迅速膨胀的情形下，我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韬光养晦”不再适用于我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十年中国在世界定位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基本信念。“一元”是指只有一个国际秩序以及支持这一

秩序的价值体系；“多极”是指在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下多个大国或国际势力共存；“共治”则是所有大国和国际势力在一个共同认可的框架内为维护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而共同努力。

未来中国将成为多极世界内重要的一极，但中国的目标不是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或世界秩序替代现有的价值体系和世界秩序，而是在现有的一元体系下发展壮大，逐步实现在本世纪中下叶完成和美国的强国交替的目标。中国的利益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得到极大的伸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中国和美国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在一元多极共治的局面下，合作的前景可能更广阔。

在经贸关系上，中美的利益是互补的。这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一。即使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很长时期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仍将高于中国，其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中国的快速扩张的市场对美国大企业是有利的。我们的外交政策，要巧妙地利用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一方面要加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创造和平环境，使美国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未来中国的国内市场，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市场之一，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为各国企业创造巨大的潜在商机。这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完善国内市场的竞争规则，在国际经贸关系上加强与外国企业的公平贸易。

当今世界的国家间竞争格局，实质上是文明的竞争。中国今天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背后并不存在一套持久的文化体系。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大国，在演变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大国统一性。传统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试图打造同质化一体化的内部，但是帝国在内部允许各种各样的差别。实现文明基础上的一统，需要承认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允许不同的政治制度存在，实现不同民族的和谐共处。我们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创造出多元一体的文明。

# 一. 回顾与展望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发展，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多项改革，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发展潜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最近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领导层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就业、三农、社保等改善民生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上。十年来，城乡就业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和财产稳定增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同时，必须看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结构问题，一些方面的改革进展迟缓，深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艰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产业结构不合理，要素配置失衡，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增多，官员腐败现象多发等。这些问题为未来十年的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指出了可能的方向。

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发展是关键性的十年。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即在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增长一倍的目标。未来中国具有持续地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潜力，但是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需要面对诸多挑战，克服诸多困难。这些挑战和困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从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优化经济结构中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源泉；第二，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成功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仅仅是扬汤止沸，而应当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消除问题的根源。

从长周期的视角观察世界经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到目前为时的振荡波动是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一个阶段。未来二十年世界经济将处于这一轮长周期的中后期，即衰退、萧条和复苏的时期。1980 年至 2030 年的 50 年是一个完整的长周期。这一长周期的前 25 年是繁荣期，目前 10 年是危机酝酿爆发和扩展期，未来 15 年是萧条复苏期。在经济长周期中，不同经济体将呈现不同的发展特征。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日本化”时期，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货币政策无法按照常规的方式进行，只能通过非常规政策刺激经济。第二，国家债务问题

突出。第三，老龄化问题严重，而各种政治力量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第四，政治分化加剧。欧洲、日本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加剧，很难求得妥协。发达经济体，在近期处于长周期的中段，整体金融创新步伐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步伐较前二十年放缓，结构调整步伐加速，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一步突出，技术产业转移处于不稳定状态。全球经济演变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国政策的协调日益重要。在这一国际经济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应该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11年 GDP 名义量达到 46.6 万亿元，或 7.21 万亿美元。2010 年，中国经济按人民币名义量和美元名义量计算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sup>2</sup>2011 年美国 GDP 总量是中国的 2.1 倍。表 1 显示了中国在 2000-2011 年期间对美国的追赶。以美元计价，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对美国每年的名义追赶率达到 14.1%，这意味着每隔五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大约缩小一半。

**表 1 中国相对美国的经济追赶：2000-2011，%**

	中国		美国		中国-美国	
	累计	年均	累计	年均	累计	年均
GDP 实际增长	114.2	10.4%	17.3	1.6%	96.9	8.8%
GDP 通缩指数	52.0	4.8%	25.3	2.3%	27.7	2.5%
GDP 名义增长	167.2	15.2%	42.6	3.9%	124.5	11.3%
汇率（直接标价）	-24.1	-2.2%	100.0	0.0%	-24.1	-2.2%
美元衡量经济增长	197.2	17.9%	42.6	3.9%	154.6	14.1%

注：2000 年为基年。中国/美国累积为每年增长率差额之和，年均均为年均增长率之差。人民币采用直接标价法表示，负值表示人民币升值。

<sup>2</sup>在比较中美 GDP 总量的时候，本报告将主要使用名义 GDP，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 GDP”。实际 GDP 反映的是一国居民的生活质量，但不反映两国的相对购买力，而名义 GDP 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当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 10% 的时候，中国的实际 GDP 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居民持人民币购买美国产品或服务时的购买力却提升了 10%。因此，在确定国与国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地位的时候，名义 GDP 是比实际 GDP 更好的指标。

数据来源：1978-2011 年中国 GDP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美国 GDP 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人民币美元汇率 1981-2011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假设 2012-2020 中国经济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每年保持 7.5% 的增长率，2021-2030 年每年增长 6%，在此期间，美国经济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以 2.5% 的速度增长；再假设美国的年通胀率为 2%；中国年通胀率 2012-2020 年为 4.5%，2021-2030 年为 4%。2012-2020 年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名义升值 1.5%，2021-2030 年汇率保持不变，则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名义增长率 2012-2020 年为每年 12.0%，2021-2030 年为每年 10%，以美元计价名义增长率 2012-2020 年为 13.5%，2021-2030 年为每年 10%。美国的名义增长率 2012-2030 年为每年 4.5%。表 2 给出了对 2020 年和 2030 年中美的名义 GDP 的预测。根据表 2 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将达到 22.9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sup>3</sup> 2030 年，中国的 GDP 将达到 59.4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 1.7 倍。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到 2020 年将升值到 5.64 元/美元。

**表 2 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预测**

年份	美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美国	汇率
	(万亿美元)	(万亿元)	(万亿美元)	(倍数)	(人民币/美元)
2020	22.40	129.23	22.91	1.02	5.64
2030	34.79	335.18	59.43	1.71	5.64

假设世界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以年均 7% 的名义增长率增长，到 2020 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从 2011 年的 10.4% 上升到 17.9%，而美国经济占世界

<sup>3</sup> 各国经济学家按不同假设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的时间进行了预测。IMF2011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 2016 年超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阿文德·斯普拉棉彦（Arvind Subramanian）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 2010 年就超过了美国。



经济的比重将从现在的 21.6% 下降到 17.4%。2011 年中国人口约 13.1 亿，人均美元收入约为美国十分之一。2020 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 13.7 亿，则人均收入约为 1.67 万美元。按上述预测十年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时，中国人均收入指标有望从目前中低收入提升为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不过届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预测人均收入 30%。

在长期，传统的、依赖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对增长的贡献逐步缩小，潜在生产能力会缓慢下降。未来十年需要转变现有的增长方式，通过化解过去积累的结构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使经济的潜能得到释放，在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解决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最关键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加快深化市场取向，把经济当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这样，一方面经济能够更加持续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也会更加公平，社会秩序会更加稳定。

## 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际标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未来十年，中国面临保持经济增长动力、克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

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ex)的统计，全世界 214 个国家或地区，以 2011 年美元计算，2011 年年末人均 GDP 超过 4000 美元的国家有 98 个，占国家总数的 46%。在这 98 个国家中，人均 GDP 水平超过 12000 美元的有 53 个，已经进入高收入阶段。这 53 个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到高收入水平平均花费 12.4 年。人口规模 1000 万以上的国家，由于大国优势明显，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平均消耗 11.9 年时间。

目前有 45 个国家人均 GDP 处于 4000-12000 美元之间。一些已经进入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及军事矛盾的长期累积，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这种状态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变化剧烈。在变化面前，一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时存在盲目性。一些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和大企业垄断的发展模式，忽视中小企业和民众利益，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为缓解社会压力，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民粹主义的高福利分配政策。在政府财力难以支撑这些福利分配政策时，又采取超发货币和举借外债的政策，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由于绝对收入水平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用相对收入来衡量中等收入陷阱更为适宜，也就是用一国相对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比例来衡量该国的相对收入水平。以相对收入衡量，日本明治维新时为低收入国家，其人均 GDP 约为当时最富有国家的 20%左右，随后这一比例逐步上升，2011 年达到美国的 95%。对中国而言，需要观察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相对收入能否不断上升，据此判断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借用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在特定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下，经济收敛于一个特定的稳态。在稳态水平上，经济体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如果该稳态均衡点低于 12000 美元，则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该稳态均衡点低于 4000 美元，则落入贫困陷阱。此时需要很强的外力推动才能摆脱这一陷阱。由于各国的生产函数和储蓄率的不同，各国经济的稳态可能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可能陷入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打破低效率循环的状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如果不能及时深化改革，化解

社会矛盾，改革就有可能进入锁定状态，遭遇左右两方面激进主义的夹击，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我们对这种可能必须加以警惕。

##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我国目前面临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一方面，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扩大，全社会调整收入分配的呼声强烈。

未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根本因素。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趋缓。我国长期以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赖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防止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同时改善投资结构，改变过分依赖房地产投资的投资结构。同时随着资本的深化，资本报酬出现下降的现象，因而未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会有所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负增长。首先，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过去几十年我国劳动年龄的人口持续增长。在对外开放、劳动力充足、储蓄率高的现实环境下，没有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人口红利成为我国 30 年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源泉之一。分解过去 30 多年我国高速增长来源，劳动的贡献约为 8%，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贡献约为 4%。抚养比的下降作为狭义上的人口红利，贡献了 7%。此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来自资源配置的改善。<sup>4</sup>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每一种生产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包含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就会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2010 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时，15-59 岁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因此至 2010 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sup>5</sup>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的同时，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群体事件的频发。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均贫富传统的国家，在大众媒体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调整收入分配的强烈呼声带

---

<sup>4</sup> 蔡昉，“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未来十年的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sup>5</sup> 同上。

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收入分配政策发生错误，就可能刺激左右极端思潮的膨胀，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挖掘增长潜力，合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克服诸多挑战与困难。这些挑战和困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从完善经济结构中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源泉；第二，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社会的稳定，成功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目前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是贪污腐败现象和民众的不满情绪。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利用再分配的手段解决收入不均问题，这是扬汤止沸。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最重要还是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把问题的根源消除。比如，腐败的问题，有租金就会滋生腐败行为，只有将租金去除，腐败才会减少。

**改进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初次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改善初次分配可以较好地缓解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个新的提法是，调整两个比重，一是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二是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再分配要更加重视公平。收入分配问题的较好解决方式是，在初次分配的时候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再分配作为一种补充手段。

要在初次分配中同时达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使经济最有竞争力，最有效率。同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区段，可以创造更多就业，让一般工薪阶层得到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果实。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非常有竞争力，创造非常多的剩余，增加更多的资本积累。因此就能够逐渐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向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则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过程中，工资会以很快的速度上涨，资本回报会逐渐下滑。低收入者的劳动力越来越值钱，高收入者的资产相对越来越不值钱，收入分配的现状就会从根本上改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也逐渐改善，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非常快，为什么收入分配却越来越恶化呢？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有关。金融抑制、资源价格不合理和垄断问题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垄断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贪污腐败。因此，收入分配的问题和贪污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我们改革没有到位的问题。

未来的十年，如果真正要实现两个“翻一番”、实现调整“两个比重”，初次分配就必须同时注重公平和效率。需要深化改革，把双轨制的改革过渡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不仅经济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而且经济发展越快，收入分配应该越来越完善，而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已经具备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极端低下、资本极端短缺，有些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需要继续靠补贴维持生存。目前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 6000 美元，资金并不短缺，是有自我生存能力的，没有必要再给予补贴了。如果适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均衡增长。**未来十年，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需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适度增长，需要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寻找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通过解决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调整经济结构的失衡，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在源泉，扩展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边界。

在供给方面，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一个源泉正是改革。通过改革完善我国的经济结构，挖掘每一生产要素的潜在生产能力，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完成市场化改革。我国国有垄断性企业缺乏良好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在一些领域政府不允许具有创造性的其他企业进入，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失去了活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通过企业自动进入和退出机制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另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行业内企业之间生产率差异巨大，明显高于美国。倘若我国企业间生产率差异与美国持平，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

30%-50%。<sup>6</sup> 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注意减少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过度介入。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使用过度以及政府过多介入，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例明显高于沿海地区，这种产业结构偏离了资源结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要纠正产业结构的扭曲，需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重新合理配置资源，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同时需要深化金融改革，稳步实行利率市场化，抑制过度投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个源泉是创新。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建立和改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国家和社会需要增加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持。创新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增加教育投资，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理念。在国家财力显著改善的情况下，需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为不同背景、不同收入的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创造和积累人力资本。

在创新问题上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认识到，资源配置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机制完成的，政府需要起一定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和功能，需要在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探讨和区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功能。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产业只有达到世界技术的前沿，才一定需要自我研发。我国的大部分企业目前尚无能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企业如果没有补贴进行创新，就可能无法在市场中生存，而补贴就意味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做会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需求方面，需要进一步挖掘有效需求，开拓国内和海外市场，调整总需求中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结构，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同时适当减少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份额。扩展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是稳步推动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拓展国内市场，发展中产阶级。城市化是扩大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需要坚定不移地稳步地推进城市化。同时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城市住房市场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周密设计，精心实施，妥善公平处理各方利益，同等保护公有和私有产权。成功地进行城市化改革，还需要通过税收体制的改革，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明确划

---

<sup>6</sup> 蔡昉，同注释 4。

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收入来源，使地方政府获得可靠的收入来源，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

**长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为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保护和培育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需要重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护产权。只有产权得到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进行技术的创造。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个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投资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人们愿意投资人力资本，愿意获得教育提高自己的技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一定是由于社会提供了条件，人们看到了投入会带来回报的希望。所以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取决于社会结构能否保持良好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代际流动，是一种社会弹性，是社会垂直通道的畅通。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年轻人不管出身背景、家庭条件，都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他就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样的社会才有活力，这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才有保证。中国过去近三十年，尤其是前二十几年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释放了社会活力，打开了原来十分僵化的社会通道。我国在这方面经历了成功的发展，然而最近社会结构的变动却出现了一种反向的趋势。这种反向趋势与市场经济制度和竞争环境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有关。相对来说，优势阶层容易利用这些机会更加扩大自己的利益，其他非优势阶层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挤压。无论从数据来看还是从现象来看，代际相关性在提高，社会流动性在下降。中国社会固化的趋势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无论结构调整还是政策调整，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都无法保证。我们希望新的领导人不只是关注这一届任期内的经济增长，而是把中国更长远经济增长的基础夯实。从现在开始做社会结构调整改革，真正打造具有充满活力的社会，保持中国经济长远的不断进步。

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结合整体国际市场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国际规则的制定对于我国未来的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制肘，推进和凝聚改革共识。培育新兴的利益集团可以冲击既得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集团对资源的垄断进行冲击，促进市场化改革。

### 三. 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缺乏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滞后，经济体制改革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状态使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十分突出。

尽管在一些方面滞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认为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看法是片面的。没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国家构建了一套全能主义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个体制是以单位制度为细胞，以纵向关系为基本结构，高度中央集权的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到单位都是同质的结构，是政治、经济、社会高度一体的结构。这种结构对于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极其有效。1978年以后，邓小平首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建设首先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其次需要按照市场规则制定行为准则。因此1978年以后的改革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这个过程也结束了全能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从政府角度来讲，五次大规模的中央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一个全面管理社会的政府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主的服务型威权政府，市场经济的地位才能够得以确立。

#### 政治体制改革

一般所讲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家和社会、个人的关系，第二是国家权威的来源基础和行使方式，第三是国家、社会、个人的行为规则。1978年以来，第一方面的改革做的很扎实，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透彻的论述。1982《宪法》明确规定了党要在宪法的框架下执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人民的概念，改称“公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改革过程中，全能体制的政治资源，被转化为推进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工具，形成了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特点的威权体制。这种体制具有较高的行政绩效、动员能力，但自主的社会系统发育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上



的作用较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权力再次逐步扩大。一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社会稳定，开始关注公平、正义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政府权力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扼杀了市场的活力。垄断性国有企业和钱权交易形成垄断性利益集团，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级分化。近年来，数量巨大的官员腐败问题和社会群体事件显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以下任务。首先，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规范各级政府的职能，优化政府间的职能分配，把不应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第二，党政分开。这是邓小平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描述，第一个就是实行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主要是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没有这个分开，前面的一系列分开是很难真正落实的。由此可以实现一个现代的宪政政府，一个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进行机构改革，而党的机构没有改，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改革。这是政府职能转化和民主制度构建的前提。就中国的现实条件而言，党政关系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如何既实现党的领导，又贯彻现代政府治理原则，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共产党的大智慧，也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第三，宪政建设。宪政就是在民选代表制约下的有限政府。民主化应当通过宪政秩序的安排来展开。一党宪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后来一直没有解决。需要通过《宪法》、《党章》这样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党和国家的关系，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处理党和人大等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各种违宪问题。宪政的标准就是保障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邓小平1978年提出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1982年改变了保护特定阶级的利益的提法。根据宪法，要保护工人，保护农民，保护教师，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大家权利平等。中国需要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要把构建宪政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未来改革的首要目标，要把宪政明确写进改革纲领。宪政与民主的

关系，应当宪政在前，民主在后。必须认识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初期的宪政并不是民主的。

第四，创造民主机制。现行制度如果不创造某种民主机制就很难长治久安。要想实现民主，政府职能转化是很重要的，党政分开是民主的基本前提。邓小平时期曾经对民主有过设想，从基层民主开始逐步扩展到全国民主。县级直接选举，县以上选出来的代表间接选举省一级官员，省级代表再间接选举中央一级官员。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如果在民主机制方面不多做一点工作的话，对于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我们党体现人民意志是不利的。

第五，法制建设。过去二十年的法制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西方现代法制，但与中国社会文化脱节。第二阶段重返实质法制，提出以人为本，但强调依法治国不够，没有实现以人为本和依法治国的平衡，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下一步的目标要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司法的相对独立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第六，重建社会秩序，发展公民社会。需要考虑城市化改变城乡格局以后的社会格局，即以哪一级行政机构为社会结构的支点并依此构建社会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在现代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约束下，以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县级城市为未来城市化支点的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公民社会的缺乏，造成民间缺少自组织力量。威权政治把社会矛盾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不断加大控制，使社会矛盾难以及时化解，公民社会难以发展，可能助长民粹主义情绪，造成极端势力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政府控制下稳步发展公民社会，利用公民社会对人民进行民主训练，通过公民社会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第七，探索中国真正的核心价值观。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过去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基本上是失败的。目前社会秩序混乱、道德价值崩溃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树立核心价值观。重塑价值体系，需要回归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同时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真正的核心价值观，牵涉到中国文化的中华民族本性的问题。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包括器物层次、组织层次、核心价值层次，这五千年真正不变的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它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时代里面不一样，但是内涵是延续的。这种绵延不断的文化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里面，所以它的发展是有基础

的。我们必须真正愿意面对它、接受它。

财政体制改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民主政治是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权的制衡问题，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审议和制约的问题。预算民主就是征税人要经纳税人的同意，花钱要让纳税人知道，通过人民代表制约政府的支出行为。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的问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非但不能保持我国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政府体制改革，要“做实”人大和政协，把人大常委扩大，专职化，建立财经委、预算工委等有实权的组织机构，预算只有经过人大批准签字后才能实施，政府部门才能调拨资金。

今后十年是政治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时期，中国有很好的条件可以践行政治改革，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政改成功，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华民族也能走向稳定、政治健全的社会。如果今后十年在政治上不能取得有创造性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政治的长期稳定。

## 倒逼与实验

中国体制的一个优点是，国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实验，取得经验，再推广开来。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包括：（1）倒逼原则。任何重大改革都是在足够的压力下启动的。足够的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只有出现了危机，人们才能形成共识，看清道路，决然前行。包产到户、加入世贸组织和引进外资倒逼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典型的危机诱导型改革。（2）相信草根的智慧、尊重人们的选择。顶层设计必须有来自底层的压力推动。（3）推进渐进实验性试-错型改革，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验，由点及面，控制风险，通过整个社会无数次试-错活动成就改革大业。

从改革的推动力的角度分析，三十多年的改革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

常规性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是边际性、部门性的，通常不涉及对基本体制框架的挑战，争议相对较少。这类改革也可能效果很好，但是从体制转型的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其影响较小。过去十年有大量的这类改革，比如“三农”问题中的农业减税和免税。第二类改革是突破性改革。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体制框架边界进行拓展，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效果。比如九十年代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立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进行的宏观财税汇率等一系列改革，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复关入市”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性，拓宽体制的边界。但不一定是帕累托改进，往往是利益的交换，争议也较大。第三类是系统性改革。涉及到经济的战略、政治的理念，包括 1982 宪法确定的政治改革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预先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人集体经验的结果。

矛盾的倒逼对改革的启动至关重要，历史上很多改革都是倒逼出来的。倒逼因素随着改革的发展不断变化。目前可能的倒逼因素包括：（1）维稳。随着群体事件的频发，维稳日益成为各级政府考虑的重要因素。维稳背后是各种社会矛盾，例如行政权力行使的不公。年轻一代维权意识、公民意识的加强也增加了解决这类问题的紧迫性。只有从根本上通过改革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从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2）腐败问题。腐败腐蚀政府和社会机体，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可能亡党亡国。腐败问题是群众非常关注、高层也十分重视的问题。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3）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近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其原因包括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需要及早应对。（4）房价。房价的高企引起城市居民不满，其背后是货币过度扩张和土地转让问题。房价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性的限价来控制，必须解决其背后的一系列体制问题。（5）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来有两个因素在倒逼国有企业改革，第一个是公众对国有企业的“长子”地位的看法与其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第二个是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政府高级干部人事上的交换任命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6）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对改革的压力。（7）思想界对于中共党史问题的新认识、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对文革灾难的反思，都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8）目前改革的共识度、改革的呼声、民众对改革的期盼与改革实际

进度的差异，可能成为改革的动力。（9）人口老龄化造成的问题，可能促进人口政策的改革。（10）城市化引起的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问题和城市内部新的贫困和治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成为推动城市化稳步前进的因素。（10）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一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倒逼机制。（11）党内用什么方式解决争端的问题，是促进党内生活规范化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重大改革都与压力有关，有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有压力才能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危机诱导改革，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分清对错，选择可行的路径。包产到户、加入 WTO 都是典型的危机诱导型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相信人们的智慧、尊重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进行渐进的实验性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由点及面，才能控制风险，作出明智的选择。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掌握的资源增加，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然而，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官员改革的动力反而减少，既得利益使改革速度减缓。需要寻找新的促进改革的倒逼因素。未来 5—10 年，中国将有很多改革出台。其中肯定有常规性改革，医疗改革、社保改革今后会常规化。同时突破性改革的机会会大大增强，人口问题、宏观利率汇率问题，这些过去十年争议很大的问题，都有改革的机会。在制度变化、改革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我们长期等待，有时候长期积累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爆发，可能就会出现突破性的变化。根据各种情况分析，中国目前改革的突破口可能是与制度改革相关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处于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的交集，例如城市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财政预算改革。一方面，这些问题是经济问题，涉及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具有充分的改革必要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这些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这些改革为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提供了理由和依据，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 四.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世界定位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上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将在八年左右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七次新兴强国超越传统强国的事件，其中六次都导致持久的对抗或惨烈的战争。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避免剧烈的国际冲突甚至战争？我们认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 中国在世界定位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经济体量迅速膨胀的情形下，国内和国外的多种因素都要求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韬光养晦”不再适用于我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十年中国在世界定位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基本信念。“一元”是指国际秩序以及支持这一秩序的价值体系只有一个；“多极”是指在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下多个大国或国际势力共存；“共治”则是指所有大国和国际势力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国际框架内为维护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而共同努力。

未来中国将成为多极世界内重要的一极，但中国的目标不是以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或世界秩序替代现有的价值体系和世界秩序，而是在现有的一元体系下发展壮大，逐步实现在本世纪中下叶完成和美国的强国交替的目标。

国际事务中充满了变数和风险，需要一个强大且稳定的势力维持世界的安宁，这就是一元秩序。为什么需要一元秩序呢？首先，一元秩序消除了多种势力之间对国际主导权的竞争，从而节约了资源。其次，一元秩序有利于节约国家间的交易成本。国际秩序是一种国家间的制度，一元的制度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确定性的保障，一个国家知道另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情形下将如何行事，也知道另一个国家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事规则，就容易形成稳定的均衡。第三，一元秩序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国际秩序总是由先发国家主导和维持的，后发国家只要不挑战这个秩序，就容易得到先发国家的认可，从而有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发展本国经济。第四，一元秩序维护一致的价值体系，排除了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从而大大降低了国际冲突的概率。

世界未来的一元秩序，需要多极共治才能实现。首先，多极共治是美国在其相对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自身的要求。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独霸世界，但是，“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债务危机，使美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中国承担部分国际政治军事责任顺理成章。

其次，其它国家有参与全球治理的愿望。第三，多极世界不一定要多元分治，一元秩序比多元秩序好。只要参与国家具有足够广泛的利益重合，多极世界就能够实现共治。第四，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在多极世界里参与全球共治比单打独斗或另起炉灶要好。另起炉灶则直接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不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容忍。中国的利益可以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得到极大的伸展。在多数国际机构中，投票和决策权的分配是以一个国家的 GDP 相对于世界 GDP 的份额为基础的，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的投票和决策份额必将大大提高。

美国相对地位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球还产生不了能与美国抗衡甚至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势力。美国的最大优势是它具有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格局中美国不再是享有绝对权威的盟主，但仍然是唯一具有主导地位的大国。

参与一元多极体系，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会失去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既有对抗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而在一元多极共治的局面下，合作的前景可能更广阔一些。对抗的一面首先表现为一个现存的强国与一个崛起的强国之间的利益较量和抗衡；其次是两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价值观上存在相互排斥的一面；第三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捍卫主权和统一，而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亚洲战略部署，双方存在军事上冲突的可能性。两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是由一些基础性的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但两国关系也不会成为一种完全敌对的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形成了共同利益，可以用更为理性、务实、智慧的态度和方式看待双方制度、观念上的差异，处理分歧和矛盾，化解危机。

## 中美关系的经济政治基础

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上，中国和美国利益是互补的。这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一。即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远远低于美国，中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未来很长时期中，美国的人均收入仍将高于中国，其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美国的大公司希望找到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市场。中国的快速发展

对美国大公司是有利的。我们的外交政策，要巧妙地利用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一方面中国要加强军事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的发展来说，最优的选择还是创造和平环境。要创造和平环境，就必须使美国大公司能够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利益。未来中国以内需为主的市场，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市场之一，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为各国企业创造巨大的潜在商机。要把潜在商机变为现实的商机，就要求中国在未来进一步开放，完善国内市场的竞争规则，进一步在国际经贸关系上加强与外国企业的公平贸易。即使有一天，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接近了，两国之间竞争加强了，如果我们也是开放的，也是专业化分工的，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对美国企业也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加强经济的对外开放。

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但也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美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尽管存在某种程度的贸易失衡和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从未间断，但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依存度却愈来愈强。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需要美国和中国联手主导，经贸的相互依存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在安全领域中，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核扩散的危机，双方在共同利益下也正在合作。

在一元多极共治体系中，中国和美国之间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其核心是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平正义的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如贫穷、核扩散、恐怖主义威胁、环境与气候恶化、粮食与能源保障、教育与卫生改善、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合理利用等。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

与美国进行合作不等于放弃中国自身的利益。在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方面，中国必须显示出保卫自身利益的决心；对于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成分，中国要积极推动改革。但是，从策略上考虑，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不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地位，而是进行增量上的改革。也就是说，中国参与一元多极共治，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合作者，但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创新者。



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面临不确定性、结构失衡等各种各样的难题，但是也有很多方面是确定的。首先，大国关系基本上是确定的，冷战以后确定的制度秩序不再容易出现大的变故。其次，新兴的金砖国家发展起来了。而全球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网络媒体、阿拉伯之春、伊斯兰革命，这些问题可能比传统的大国问题更为棘手。最后，解决好国内矛盾对于处理国际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 重建中华文明

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必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当今的世界的竞争格局，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如果从深层次的文明角度来看，国家冲突实质上是文明的竞争。如今美国、欧盟和新崛起的中国三分天下，背后都有文明的因素。世界的称霸战除了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方面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明话语和文明制度的竞争。

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新教文明，能够不断地将其他文明内化，依然具有非常强大的竞争活力。而欧盟中发展较好的德国，也是一个新教国家，也保有新教伦理所拥有的竞争情节。今天欧洲之所以衰落，部分原因也要归结于拉丁文化的负面影响，归结于悠闲的拉丁文化对竞争性的排斥。如今的法国、意大利，都存在这个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背后都是因为存在文明的缺陷。

反观中国，今天的崛起只是一个富强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现今的中国人比欧洲人更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人，我们具有一种永不停歇的冒险进取精神。中国崛起的秘密从文明角度来说可以以此解释。然而中国目前还只是围绕着富强崛起，还不是一个文明的崛起，背后并不存在一套持久的文化体系，缺乏一个新的中华文明 2.0 版。现今我们在世界上并不掌握话语主动权，“挨骂”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们不掌握文明的话语权、不掌握规则的制定权。改革开放至今，中国都专注于国内自身问题的解决，对国际事务的规则方法依然十分陌生，对以国际法权为基础的国际法则和文明的普世话语相当隔膜。

中国的自身定位牵涉到两个历史性的独特因素：第一，中国是一个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在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的演变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大国统一性，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事实。传统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在于民族国家试图打造同质化一体化的内部，但是帝国在内部允许各种各样的差别和多元。

当今中国的内部事务非常复杂，如一国两制、少数民族自治问题，显然不能仅仅用简单的认同和一体化来推进文明。那么如何承认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允许不同的政治制度存在，实现边疆不同少数民族的和谐共处，甚至实现不同省份地区共存的不同模式，在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一统？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换思路，重新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明价值、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民族未来进行思考，这也正是未来中华文明 2.0 版要回答的问题。今天除了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还扮演前二十世纪帝国的部分角色，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在世界史上仍然保持二十世纪前旧帝国基本幅员和人口的国家。所以，简单抛弃以前二千多年的政治历史，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解体的第一张骨牌，中国并没有倒下，还迅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在这两个前提上讨论中国政治定位是有意义的。而这两个前提其实都遇到巨大挑战，第一个前提是所谓多元一体的中国，虽然中国领土还没有统一，但是这个基本多元的国家系统是讨论中国位置的基本前提。第二是社会主义政治结构，党国结构是它的基本构架。喜欢它的人或者不喜欢它的人，都必须以它作为历史性前提来讨论我们未来的变迁。

中国民主问题很重要很复杂，但是民族问题更复杂，这个问题今天就需要提前应对。中华文明可以同化那些没有高级宗教和文明的一般少数民族，但是我们很难同化那些有和我们同样悠久的高级宗教文明的民族。因此中华文明的重建并不是一个儒家复兴的简单问题。如何把一个文明内部的不同文化整合起来，需要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历史上中国就不是单一神教国家。按照这个经验，也可以把儒家、道家、佛教、藏传佛教用一种方式进行多教合流，创造出多元一体的文明。

目前中国实际上正在介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仅是南南关系，而且是南北关系、北北关系，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都面对着对话的格局。中国需要对非西方地区有更多的理解和了解。在对非西方地区的关系上，如果中国重复过去欧洲人的道路，将会引发新的冲突，甚至引发国际地缘秩序的变化。因此，未来中国人在传统型、多样性、区域关系、内部关系等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定位的时候充分考虑。

“韬光养晦”是过去 30 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的原则，它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发展空间和时间。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急速膨胀，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对其它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负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我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也需要我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对我国企业和个人的利益提供更多的保护。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需要将“一元多极共治”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定位，我们要做现存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而不是推翻现存秩序或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和现存秩序竞争的新秩序或新的价值体系。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早作规划，向世界明确说明我们的战略目标，与美国分担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治理责任，实现强国之间权力的和平交接。